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2辑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历史与理论

赵稀方选集

赵稀方 著

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s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2辑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编委会
编

历史与理论

赵稀方选集

赵稀方 著

（此处为模糊的出版信息，可能包含ISBN或定价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历史与理论：赵稀方选集 / 赵稀方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11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2辑）

ISBN 978-7-5360-7308-1

I. ①历… II. ①赵…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7542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杜小烨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林露茜

书 名	历史与理论：赵稀方选集 LISHI YU LILUN ZHAO XIFANG XUAN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625 2 插页
字 数	29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2辑编委会

主 编 张 炯

编 委 曾敏之 张 炯 饶芃子 陆士清
陈公仲 刘登翰 杨匡汉 詹秀敏

出版说明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的流播，也伴随有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绽放奇葩，并由此构成一道趋异与共生的独特风景线。当今世界，中华文化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无疑为我们寻找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世界性坐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的老中青学人，回应历经沧桑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孜孜矻矻地进行了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的观察与探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汇集这一学科领域的创获，为了增进世界格局中中华文化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了加强以汉语为载体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为了给予持续发展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以学理与学术的有力支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花城出版社联手合作，决定编辑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这套“文库”，计划用大约五年的时间出版约 50 种系列图书。

“文库”拟分为四个系列：自选集系列、编选集系列、优秀专著

系列，博士论文系列。分辑出版，每辑推出8至10种。其中包括：自选集——当代著名学者选集，入选学者的代表作；编选集——已故学人的精选集，由编委会整理集纳其主要研究成果辑录成册；优秀专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专著，由编委会评选推出；博士论文——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由编委会遴选胜出。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将以系统性、权威性的编选形式，成就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典。其意义，一是展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学术成果；二是抢救已故学人的研究力作；三是弥补此一研究领域的空缺，以新视界做出新的开拓；四是凸显典藏性，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人文价值。

“文库”在编辑过程中，参考并选用了前贤及今人的不少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众多方家深表谢忱。由于时间仓促，遗珠之憾和疏漏错差定然不免，尚祈广大读者多加赐教。

花城出版社

2012年10月

目 录

香港的文化身份	1
香港的城市经验	41
香港：“边缘”的政治	77
在殖民地台湾，“启蒙”如何可能？	99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121
台湾的新殖民批判	134
台湾的后殖民演绎	157
后殖民的版本和定位	176
萨义德·马克思·福柯	201
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	225
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少数话语	257

附录

学术自述：学术的无奈与精彩	274
学术访谈：学术解魅与反抗虚无	278
赵稀方华文文学学术年表	291

后记	295
----	-----

香港的文化身份

在后现代的历史视野中，从来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只有历史的叙述。需要澄清的是，后现代历史观并非不承认历史本身，它以为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历史事件却不能自动呈现于我们，而必须通过叙述表现出来，这种历史叙述并不是客观的。这种非客观性既来自于历史，也来自于语言。福柯认为，文本的操作是一种话语实践，它植根于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之中。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事件只是因素，经过加工才能成为故事。

既然对于香港的历史叙述无不受制于各自的立场，那么香港的文化身份究竟能否得到呈现呢？怎样得以呈现呢？这是我们在论述香港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背后，事实上隐含着这样一个潜在的前提，即认为文化身份是一种固定、统一的东西。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有关文化身份的论述在此或可给我们启示。霍尔关于文化身份是一种未完结的“生产”的说法，常常为人称引，这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在分析文化身份时对于“断裂”和“差异”的论述。霍尔认为，一般将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同的文化，但“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在他看来，身份“决不是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

自身规定了我们的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①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霍尔根据三种“在场”——非洲的在场、欧洲的在场和美洲的在场——来重新界定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被殖民统治的香港文化身份，不是也正可以在几种不同的历史叙述之中加以展现吗？当然，香港与加勒比地区的历史情境既有类同又有差别，本书所选择的“在场”自然有所不同，它们分别是“英国殖民书写”“中国国族叙事”和“香港意识”。

一、殖民叙事

（一）

关于香港的英国叙事，其情形与霍尔对于加勒比人文化身份的描述完全一样。“非洲是未被叙说的一个例子，欧洲则是无休止地叙说的一个例子——并且是在无休止地叙说我们”。香港开埠百年之内的历史叙述全部来自于英文史著或报刊。英国殖民者的香港叙事主要是依赖于印刷媒体如报刊、史书等来完成的。香港开埠之后他们几乎垄断了所有叙事文本。英国人创办的报刊有：*Hong Kong Gazette* (1841)、*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1842)、*Hong Kong Register* (1843)、*China Mail* (1845)、*Daily Press* (1857)、*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53)、*Hong Kong Telegraph* (1881)，不仅这些英文报刊，如《遐迩贯珍》(1856)等中文报刊也是由英国经营的，一直到1873年，由华人创办的《循环日报》才出现。至于香港史的领域，可以说完全为英国人所把持，香港的历史叙事几乎完全为英国殖民者所垄断。早在1895年，就有E. J. Eitel撰写的*Europe in China*这样厚厚一大本香港史的出现，其后出现了大量的西人撰写的香港史，如G. 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①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收入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Coming of Age; G. 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the Years of Discretion*; Hennessy James, Pope, *Half-Crown Clony, A Historical Profile of Hong Kong*; Endacott, G. B.,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Endacott, G. 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等等, 中文的香港史直至百年之后的 20 世纪中叶才出现。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叙事中的历史想象和叙事策略如何呢? 本文试图通过香港史上的报刊、史书、小说等文本对此加以分析。

中国南方的海岛香港, 原与英国毫无干系, 为了合理化英国对于香港的占领, 英国的香港叙事首先改变香港与中国及欧洲的空间关系, 确立香港与英国的渊源。

出版于 1895 年的艾特尔 (E. J. Eitel) 的《中国的欧洲》是第一部编年体的英文香港史。 *Europe in China*, 这一题目非常简洁地指明作者对于香港的时空位置的处理: 香港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 但它本不属于中国, 甚至不属于亚洲。书中开头就说:

香港从来不是亚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它对于中国政治或社会组织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它的名字从来就不为中国的地质学家和政治家所知, 是西方人给予了它在东方历史中的命名。它位于中华帝国遥远的东南端, 与英国在非洲、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遥相呼应, 组成了英国——中国自然的太平洋驿站。香港从来不是天然地属于亚洲或欧洲, 按照上帝的神义, 它命中注定要成为二者的桥梁。^①

自古代起香港地区就一直处在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之内, 岛上既有居民也有房屋建筑。但艾特尔却言之凿凿地说它从不为国人所知, 这让我们想起香港总督在占领香港后宣布香港只是一个空无一人的荒

^①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Published by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and Luzac and Company, 1895.

岛。在上述叙事中，按照上帝的安排，香港本来就不属于亚洲和中国，而是联系亚洲和欧洲的通道，天然地构成了与英国在非洲、印度和北美的领地遥相呼应的殖民地。几乎所有的英文香港史都是这样叙述的，从英国发现香港开始，然后以历届港督治理香港的政绩为章节进行叙述的。香港在英国发现之前的历史，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抹掉了，它与中国的联系也因之失去了。

除了构造香港在“本源”“神义”上就不属于中国、而与英国相连之外，英国的香港叙事还要肩负起具体地合理化英国占领香港这一历史事件的使命。英国人办的《遐迩贯珍》第1号有一篇题为《香港纪略》的文章，这篇概略性的文章并不长，却典型地体现了英国叙事对于鸦片战争及英占香港的叙事逻辑。此处容我做稍长的征引：

溯前十二载，林文忠奉命到粤，禁绝鸦片。原宜将船烟拿获，一并入官。但林文忠竟将城外商民，不分青白，及有无贩卖鸦片者，一概封锁，并将在内佣工汉人，均行撤尽，断给口食，致令各商民，备受艰难，几有性命之忧。其中竟有与烟无涉，或属传道，或属行医，或属职员，非此则彼。似此不分良歹，岂得为公平之道乎？总因林文忠尚未谙他国事务之故。盖无人不深悉我国（按，指英国），断不容无故受屈，致启后衅，即兴我国皇后（按，指维多利亚女王），彼时知良民被害，赫然大怒，即兴师旅，盖欲雪此恨，而杜将来之患也。林文忠等素轻视西邦，不以为劲敌，意以战船兵丁即来，何难除灭，以了其事。追溯昔时，中国名将奇材甚多；俯视今日，内地猛士异能不乏，以英国不过渺如渊岛，岂敌中华幅员之盛！唯英国属地，既多且广；船只人民，通行于天下，是别国一平民受害，必不肯置之罔闻。况因中华历来藐视外国，不通交往，以致外国商民，近年迭兴美利，中国竟不能稍获其益，林文忠岂不知之！彼时皇上渐悟其办理误谬之处。英兵攻克城池，径至天津具诉，朝臣允其所请，而船始南旋。迨后又复食言，故更兴兵，陆续攻克数处城池，直驶

长江，几陷江宁。其时，英官所讨，始皆允肯，军乃撤退。英国初意非为土地，只为本国之民照常贸易，免受平空之欺藐而已。后因所愿不遂，致起兵衅，我国不得已而讨取行师军饷之费，另一小岛，以备居息之所，往来商船，得以湾泊屯守，兵士借为住扎。遂择地于香港，所定文约，即于癸卯五月二十九日，互交收执，此后香港割出中国版图，永属英土地矣。^①

这段描述可作为新历史主义关于任何表述都受制于意识形态的逻辑和语言描述的修辞的分析例证。鸦片战争和香港割占，在中国人看来是蒙受帝国强盗侵略的悲剧，在英国人的上述叙事中，它却成为一段匡扶正义、报仇雪恨的喜剧故事。在海登·怀特看来，将历史事件化为特定的故事，取决于叙述者的叙事策略。这些叙事策略包括：“1. ‘精简’手中材料（保留一些事件而排斥另一些事件）；2. 将一些事实‘排挤’至边缘或背景的地位，同时将其其他的移近中心位置；3. 把一些事实看作是原因而其余的为结果；4. 聚拢一些事实而拆散其余的，这在于使历史学家本人的变形处理显得可信；5. 建立另一个话语即‘第二手详述’它与原先话语较为显著的表述层并存，通常表现为对读者的直接讲述，并且通常都向话语的显现形式提供明确的认知根据（就是说使前者合法化）。”^②鸦片战争和香港割占这一历史事件，之所以变成了喜剧的故事，正是由于这些叙事策略所达到的效果。我们可以将鸦片战争和香港割占这一历史事件的元素，按顺序排列如下：

1. 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就希望拥有中国一岛，方便对华贸易。

① 《香港纪略》，《遐迩贯珍》1953年8月第1号。

②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历史主义、历史与历史想象》，收入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2. 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在香港水域大量进行鸦片交易。
3. 清政府的禁烟令，受到英人抵触。
4. 林则徐禁烟，包围商馆，断绝供应。
5. 1939年7月，英国水手肇事，中国村民林维喜被杀害。
6. 林则徐禁绝对澳门英人的食品供应，并谕令澳门当局驱逐英人，将英人赶至香港海面。
7. 英方拟进行军事干涉，交战前英国外务大臣照会清廷，内中正式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要求。
8. 战争，条约。

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香港纪略》一文对于历史史料的加工过程。它首先忽略了第1项和第7项，只字不提英国方面因为贸易等原因一直想占领中国海面的一个岛屿，而在进攻中国之前就已明确提出要割让中国岛屿的要求，却竭力渲染英国在中国受迫害的第4项和第6项。这就使得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得以转变，原来历史的顺序是：英国人原来就希望拥有中国领土进行贸易，现借贸易争端而发动战争，实现了占领领土及开埠贸易等要求。现在变成了，因为清廷藐视英人，使其在华受到不公正待遇，女王发兵报仇雪耻，发兵中国，战胜之后“不得已”要求赔偿所耗军费，顺便占据了一个小岛。在此被忽略的事实还有第5项，即中国村民林维喜被杀之事。事实上，此事与林则徐对于英人的制裁很有关系，这后面还牵涉一个治外法权的问题。林维喜在中国领土被杀，英人却不服中国管辖，自行在海上设庭审理，这种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行为令中方愤怒。其后才出现林则徐禁绝对澳门英人的食品供应，并谕令澳门当局驱逐英人，将英人赶至香港海面的事件。《香港纪略》根本不提这一事件，将交战原因完全归结到禁烟事件之中。而在对于禁烟事件的叙述中，文章却又以极为简略的交代模糊了英方对于禁烟的态度，“林文忠奉命到粤，禁绝鸦片。原宜将船烟拿获，一并入官。但林文忠竟将城外商民，不分青白，及有无贩卖鸦片者，一概封锁……”，这一叙述给读者的印象是，英方所责并不在禁烟本身，而是林则徐不分青红皂白地冤及他人。事

实上，英方抗拒的是禁烟本身，因为鸦片交易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英方发动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求赔偿被林则徐销毁的鸦片。在军事压力下，清廷后来被迫认同英文的这一立场，只好归罪于林则徐，称“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①。经过这样的增删变动，鸦片战争及占领香港的行为就极富逻辑性地合理化了。而作为专门谈论香港的文章，在作为关键的香港割占一事却被轻描淡写地处理成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属事件。“英国初意非为土地”，只在战后要求赔偿的时候，另附一小岛。这一说明，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香港土地及其人民的命运，就被这“另一小岛”四个字决定了。

怀特认为，历史叙述的效果取决于作者的话语框架，它具体是由语言表述的比喻修辞层面构成的。在《香港纪略》一文中，有很多对于中国和英国的修辞性描述。对于中国的描绘有：“中华历来藐视外国，不能交往。”“林文忠等素轻视西邦，不以为劲敌，意以战船兵丁即来，何难除灭，以了其事。追溯昔时，中国名将奇材甚多；俯视今日，内地猛士异能不乏，以英国不过渺如渊岛，岂敌中华幅员之盛！”对于英国的描述有：“盖无人不深悉我国，断不容无故受屈。”“唯英国属地，既多且广，船只人民，通行于天下，是别国一平民受害，必不肯置之罔闻。”中国封闭自大，轻视西邦，而英国却国力强大，断不容欺负，这些看似与中心事件无关的叙述，就是此文预设的话语框架，内中词语的褒贬，构成了鲜明倾向性。由此，自大挑衅的中国受到匡扶正义的英国的惩罚，这就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无意以“中国叙事”纠正“英国叙事”。在此历史事件中，中国是受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族历史叙事就是“客观”的。以内地较为权威的《十九世纪的香港》为例，这本书在叙述鸦片战争和香港割占时，完全不提禁烟时林则徐封锁广州

^①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第13页，见《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5页。

英人会馆，断绝食水，撤走中国人之事，而这在《香港纪略》是叙述的重点，是英国发兵的原因。《十九世纪的香港》中的这一变动，令中国人变得更加无辜，而英人显得莫名的蛮横。这样，我们就读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英、中对于鸦片战争和香港割占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处理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福柯所强调的知识与权力间的关系。立场不同，侧重点就会不一样。

刊载《香港纪略》的刊物《遐迩贯珍》，是颇值得一说的。《遐迩贯珍》是香港最早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中文报刊。据此刊主编理雅各在1956年6月《遐迩贯珍》“告止序”中说：此刊“每月刊刷三千本，远行各省。故上自督抚以及文武员弁，下递工商士庶，靡不乐于披览”^①。因为英国人的汉语水平有限，故英国人办的英文报刊很多而中文报刊寥寥，在此情形下，《遐迩贯珍》就成了宣传殖民者意识形态、形塑港人西方文化认同的重要阵地。《香港纪略》一文对于香港来历的合理化叙述，目的在于在港人心目中重新塑造英人的形象，为香港的历史身份“正本清源”。

《遐迩贯珍》体现出英人在叙事中塑造西方认同的努力，它的一个基本叙述策略是，时时不忘表彰英国制度的完善，同时贬低中国人的愚昧，从而构成一种对比。如1855年8月号上有一篇禁止赌博的文章，文章在宣扬赌博为害，“大英立法严讯，既禁之于前，必不行之于后”之后，接着拿内地进行了对比，“试观内地赌风盛者，其游民必多，盗贼由此而起”^②。1855年5月号上有一篇禁止溺死女婴的文章，文章贬低了《大清律例》的有关条款，以为“父母杀婴儿一款，律无明文，官无讨罚，此国政不彰，民俗浇漓，莫此为甚”^③。英人甚至在发表香港粮饷进支时，也不忘记攻击中国：“以上所录本港旧年进支粮饷各数，读者或以为此款无关于致知格物之义，无与于

① 理雅各：《遐迩贯珍告止序》，《遐迩贯珍》1856年6月号。

② 《赌博为害，本港自当严禁论》，《遐迩贯珍》1855年8月号。

③ 《香港人数加多，幼男多于幼女论》，《遐迩贯珍》1855年5月号。

推情度理之端，载列贯珍，甚无为也。余今略说其意，盖欲以表大英等国常例耳！……尝闻中国与余为友者，说及官府所取于民，不入国库者强半；所受以给兵，而不如数以与者亦然。此言果否，余不敢置议，唯以上所陈大英等国之常例，华夏未有行之，故敢略其概，庶使行政者于修己治人之方，或未必无小补云。”^①叙述者虽说“此言果否，余不敢置议”，但却不负责地散布了国内“官府所取于民，不入国库者强半；所受以给兵，而不如数以与者亦然”的惊人事实，这漫不经心的一笔，是对中国政府致命性的攻击。上面几篇文章所述中国之腐败是否事实姑且不论，需指出的是英人叙事的别具用心。叙事都是具有选择性的，即以香港的长处对比国内的短处，比如港人一直还在遭受鞭笞等种族歧视的问题，就从未见提起。这种叙事的目的很清楚，是造成港人对于中国的疏离，培养他们对于英方的认同。

（二）

较之于历史叙事，小说是一种虚构文体，但唯其如此，小说较之于历史叙事更易于凸显叙述者的想象。

1895年同时刊行于英国和美国的由W. Carlton Dawe撰写的小说集*Yellow and White*（《黄与白》），是我所看到的较早地反映香港的英文小说。《黄与白》是这部小说集中的第一篇。小说的主人公Gresham是一个在香港的白种英国人，有一天他遇到一个中英混血女性，并为其倾倒。在发现她是一个本地中国商人的妻子后，他非常不平，“这个肥胖的中国猪凭什么拥有这样一个美妙的女性？他的黑色的斜眼，充满了狡诈和自得，他的油腻的黄皮肤，他的沉重松弛的喉咙……他恨不得马上给他的肥大的肚子重重的一拳才能解气。”他根本不顾忌这个中国男人，从正门出来后，立即从侧门爬上楼去和这个妇人约会。结果Gresham与其家人发生了武力冲突，在一系列的激烈搏斗之后，他英勇地突围而出，最后乘船离开香港。这是一个英雄救美

^①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香港全岛进支粮饷费项》，《遐迹贯珍》1855年4月号。

女的故事，所不同的，是白人英雄从黄种土人手里拯救混血女性。正如 Gresham 很容易猜测到的，这个混血女人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她是被英国父亲遗弃后，跟随母亲在香港长大的。这种香港并不罕见的现象，本身就是叙事者罪孽的象征。而在 Gresham 看来，正是这个女性身上的欧洲血液使他变得出色，他甚至担心，“她身上的欧洲血液是否抵挡得了中国血液”。这种女性被埋没在肮脏的黄皮肤的中国人之中，太可惜了，因此需要拯救。而在叙事者的笔下，这个女性也是渴望被白人拯救的，Gresham 的战斗也是在这个混血女性的召唤下完成的。在小说叙事中，格兰士成了一个侠义的英雄，其行为的正当性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本地中国人的伤害则根本无需考虑——在这里，皮肤的颜色就是其正当性的根据。

小说集中的另外一篇小说《苦力》(Coolles)，描写的是英国人在香港贩卖、镇压中国苦力的故事。800 名中国苦力在英国人的押送下，乘船从香港去新加坡。苦力们不愿意前往而与英军发生了冲突，最后演化为暴动。叙事者站在英国人种族优越的立场上，描写英国人机智、勇敢、残暴地镇压苦力的经过。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叙事会怎样叙述这个故事。我们常常会在如《海魂》这类的电影中看到下层的受压迫者揭竿而起、正义凛然的场面。在英国叙事者的笔下，情形正相反。中国苦力被轻蔑地形容为“最丑陋、最肮脏的贱民”，而暴动的苦力首领被形容为“一个丑陋的独眼猪”。在叙事者的眼里，黄种中国人不过是白种人任意支配的贱民，甚至自由买卖的畜生。

正如“黄与白”这一题目所昭示的那样，这部小说集叙述的是白种人与黄种人的冲突。故事的地点在香港及其他亚洲地区，在这里，白种人本是外来者，但他们却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种族的面目出现，任意支配着黄种人。充斥于叙事语言的对于黄种人的轻蔑和丑化，反映出早期殖民者强烈的白人种族主义意识。

20 世纪英国文学对于香港的叙述，影响最大的当属克莱威尔 (James Clavel) 的小说。他的两部写香港的小说 *Taipan* 及 *Noble House*，以英国人史迪克家族从海盗发展为香港商业界巨擘的历程为